

藏学 · 康巴学

跨越边际 —— 二十世纪上半页康区民改中的汉藏语言翻译问题

肖坤冰

【摘要】二十世纪 50 年代，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逐步实行了“民主改革”。在这段广泛的基层社会变革过程中，国家政权在康区的张力前所未有。在当时汉藏双方语言不通的情况下，“翻译”这一角色在此历史进程中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即是通过一位民改时期的“翻译”的个人经历的透视，以此展现当时的政治场景、时代更替与社会变迁，并进一步探讨“翻译”这一职业在“边缘社会”所具有的历史意义。笔者认为，“翻译”并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必须将翻译活动置于话语权力关系之中，置于历史情境之中来考虑。在实践上，翻译与地域空间结构、族群关系、社会转型和权力合法性的生成等因素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使其超越了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成为国家话语传播机制的一部分。

【关键词】汉藏翻译；跨语际实践；术语的合法化

【中图分类号】 K25/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076(2008)05-0008-05

一、一个分析文本：格旺先生的经历

1930年 6 月 2 日出生于巴塘，父亲为四川南充汉人，母亲是西藏芒康藏族，曾用汉名何多才，藏名格桑旺堆，参加工作后改名格旺。因出生在汉藏结合的家庭，自幼通汉藏双语。

1938 年，进入巴塘省立小学读书，之前曾在藏民小学读过几个月。1944 年考入康定师范学校巴塘分校，1949 年毕业。1951 年参加工作，在康定民族干部学校学习两月后分到雅安军分区侦察科任翻译，后因部队整编回到民干校。1956 年，民主改革开始，分到康定木雅区工作队，亲历了理塘平叛工作。理塘平叛结束后，随藏民团运粮至巴塘，在南区工作 21 天后，回到民干校。1956 年底，至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参加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后经申请调至五期研究班。1958 年，从五期研究班毕业后加入四川组在甘孜州进行调查并任翻译，参与了理塘、稻城、巴塘、石渠、道孚、德格等地的调查。60 年代后主要在巴塘工作，直到退休。

王明轲先生指出：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或事件，或与之有关的叙事，都是社会情境与历史过程下的产物。我们可以将这些人物、事件与相关叙事，都当作是一种“文本”。“文本”存在并产生于特定社会情境脉络中；社会情境脉络也因相应的“文本”而得以显现或强化^[1]以格旺先生的人生

作者简介：肖坤冰，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邮编：361005）

历程为一个分析文本，其生命史明显地显现出上个世纪康区所经历的社会制度变迁、政权更替、意识形态变化等时代特征。而贯穿其生命史的一个重要线索则是他作为一个藏汉翻译的政治、文化身份。这一翻译身份既使他能够较早地接触到外面汉语社团的革命话语，同时又将这种语言的力量加诸并内化于其身，使他作为一个被压迫阶级“翻身”的典型在当地的藏族群体中去自觉地传播这种革命话语，进一步地推动共产党的领导合法性在藏区的生成。

格旺先生的生命史大致上可划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他从藏区来到内地逐步接受学习和教育，由一名普通的藏族青年被培养成为一名新中国的民族干部的成长经历。这一时期基本上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学习”过程；第二个层面是他成为一名共产党的干部以后，又回到当地，作为共产党与“当地人”之间的沟通桥梁，参与了一系列民族地区的改革与建设工作。这一时期基本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反馈”过程。而不管是前一阶段的“学习”过程，还是后一阶段的“反馈”过程，从事汉藏语翻译始终是贯穿格旺先生“生命史”的重要内容。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上个世纪中叶也正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力量向川边藏区拓展和最终牢固建立的时期。在这一边缘时间和康区这一边缘地点，格旺先生的个人生命史与国家史、社区史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通过对他的翻译生涯的透视，可以从一个微观的角度来探讨语言翻译的历史和政治意义。

二、“边缘”的影响

格旺出生在一个“汉父藏母”的家庭。因此，从小也就既能说汉语，又能说藏语。而类似格旺家这样的汉藏混合家庭在当时的康区，尤其是在巴塘县并不罕见。在地理交通上，康区乃是内地与西藏的一个交界点。“它西为青藏高原扼控，是腹地通向西藏的必经之道”^[21]，自元朝以来就有许多汉商进入康区，并与当地藏民杂居、通婚，从而形成了这样的汉藏混合家庭。尤其是巴塘地区，由于地处川滇藏三省交界处，在此来往商人较多，清乾隆时期应当时商业繁荣之需曾建有三省会馆（关帝庙），光绪年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开始在此传教。在此背景下，不同的族群、宗教、风俗、语言在此汇集，使巴塘成为一个族群、地理空间、文化和语言的多重边缘。格旺先生在讲述自己的童年经历时，提到了两点，可以认为是影响到他的早期教育的两个原因：一是巴塘的文化普及得早，从外国人到来（指传教士）就开始办学，办学时间长、学生多；二是家庭成员婆婆（奶奶）的影响，婆婆坚持要送格旺和其三哥去读书，并每天亲自接送。从地域上来说，“民元乱后，学校大半停闭，番人亦无解汉字者，惟巴塘一隅，教师较良，汉人亦较多，至今能为西康人文较高之区云。”^[3]自明清以来，巴塘地区就多出“通司”（又写作“通事”，或又称“舌人”，是旧社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翻译”的称呼），民国时期的平措旺杰、邓珠拉姆、刘家驹三人被并称为“巴塘三杰”，可见巴塘地区确有优于其他地区的人文地域环境；再从家庭成员的影响来看，汉文化与藏文化实行的是两种不同的教育体系，正是因为家庭中汉族成员的存在，格旺和他的三哥才被送进了当地的小学接受教育，而不是被送进寺庙修习。此后，两人又分别考取了巴塘师范和康定师范，并在学校教育中进一步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

学校教育中的“取汉名”现象在当时的康区非常普遍。格旺开始读小学的时候，老师要求所有学生都取一个汉名，没有汉名老师就代取一个。在这一过程中，当学校老师强行将原来的以藏语表达的符号置换为汉语符号时，体制性实践在对语言的操纵中改造着当地藏族学生的认知方式。“体制性实践的各种形式以及知识、权力关系，这些形式和关系在将某些认知方式权威化的同时，压抑其他的认知方式。”^[4]教材和授课等教学实践，也分别通过印刷文字和口传语言的方式，逐步替换了当地藏族原有的认知方式和认知体系。学校使用的教材是商务印书馆印的，主要教授语文、算术两门，另外还有音乐、体育等，甚至小学生还开有“公民”一课，师范学校还教授物理、化学等现代科学知识。而开设的这一系列学科，都是当地藏族传统的认知体系中所没有的，尤其是“公民”，更是典型的随着近代“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等进步思潮进入中国以后，伴随中国“民族

—国家”的统一进程而逐步进入人们的思想观念中的。因此，从浅的层面上谈，学校的教学实践实现的是由藏语到汉语（或英语）的符号体系转换，而从更深的层次来谈，隐藏于这一套符号体系背后的乃是一套新的国家观念和政治体制的表述。

在早期学校教育的经历中，汉语的进一步提高和英语的掌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格旺和其三哥此后的人生，两人走上了两条不同的“翻译”道路。格旺以后长期在汉藏之间担任“翻译”，并被培养成为一名共产党的干部；而他的三哥因为读师范时，英语学得特别好，外国人走的时候雇他做翻译，中途留在了印度，至今仍在印度生活，此不赘述。

三、跨越边际：五十年代的翻译经历

二十世纪 50 年代是格旺的生命史中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中他不停地“游走”（travel）、“穿梭”（shuttle）于内地与藏区之间、共产党政权与反叛势力之间、汉族干部与藏民之间，其翻译经历正体现了在历史转折点中“跨语际实践”所具有的制造合法性术语的力量。其中最重要的翻译有在民改工作队中的翻译，和 1958—1962 年参加了四川省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担任其中的康区调查小组的翻译。除此之外，格旺先生还两次被选派到内地培训学习：1951 年进入民干校第九班学习；1956—1958 年就读于中央民族学院的“五期研究班”。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特别提到了殖民地的双语精英在新的政治体系建构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控制下的标准化的学校体系创造了新式的朝圣之旅，这是一种教育的朝圣之旅与行政的朝圣之旅之间的结合，其目的在于培养一批政治上可靠、心怀感激、并且同化了的本地精英阶层。^[5] 贝尔·胡克斯在其对美国黑人语言的研究中也指出，语言乃是一种斗争场所。并分析了在美国社会，标准英语如何被型塑为一个设定限制、做出界定的领域，作为一种征服和统治支配的语言而被“新世界”的黑人所使用来进行交流。^[6] 民改时期的康区，其时正是共产党所代表的国家权力向边缘的藏区逐渐渗透，以革命的话语取代封建统治的话语，并逐渐将原有地方权势集团取而代之的过程，是一方势力逐步强化而另一方力量势微的过程。政治上的权力渗透在这一特殊的区域中必然表现为语言上的汉语对藏语的渗透，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中央集权的教育系统所培养出的汉藏双语精英，正体现了安德森所说的教育的朝圣之旅与行政的朝圣之旅的重合。

具体到格旺先生的“跨语际实践”，五十年代的民干校和中央民族学院这两段培训经历对他以后的工作和生活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应该意识到，在解放初期，民干校和民族院校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一批掌握双语并通晓国家政治话语和一定专业知识的少数民族精英，以作为未来的民族干部。由于解放初期，语言不通成为共产党在类似康区这样的民族聚居地区建立政权和宣传政策时的一个很大障碍，因而，能够说汉话的少数民族就成为共产党积极争取和培养的对象。在招民干校的学员时——也即是今后的民族干部培养对象时，能否说汉话成为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条件。格旺先生即是因为能说汉话而顺利地来到了康定的民干校学习。而对于这些以后将会成为共产党在民族地区的主要骨干的培养，学校除了语言上的汉语培训，更重要的还有政治上的培训。在民干校和民族院校，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人民当家作主”等政策纲领等成为学习的主要内容，并将民族地区旧制度的罪恶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作对比，使像格旺先生这样的少数民族青年由以前的“不知道革命是什么”到自觉地投入革命。民干校和中央民院的培训通过将民族地区的部分精英请进学校——民族院校系统是国家统治行政机构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使他们逐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新生政权产生出新的认同，这在语言上表现为一套革命话语；当这些学员走出学校，回到民族地区担任起翻译工作时，这些革命话语也随之在民族地区传播。因此，在民族地区革命话语的早期发言人总是那些一半融入当地社会，一半又接受过共产党的教育培训的双语知识分子。在此意义上，“任何教育制度都是维持或修改话语占有以及其所传递的知识和权力的政治方式”。^[7] 作为双语精英，尤其是上个世纪中叶民改过程中的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他们能够在民族院校的课堂上了解到从共

产主义诞生之日起从欧洲的混乱经验以及中国自己的革命进程中萃取出来的革命理想，而这部分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其出身又大多是来自于社会底层，对于贫穷和受压迫的生活有着深刻的自我体验。课堂上激进的革命话语的宣讲和自身经验的结合，使得他们很容易地将共产党的政治宣传作为理想的社会模型，并自觉地担任起革命话语的传播者。当格旺先生再次回到民干校工作时，他就当起了课堂上的翻译，而在两段培训经所学到的政治术语则成为他翻译的主要内容。福柯曾在对话语（discourse）的深入分析中指出，话语乃是一套区分、排斥系统，仪式性的话语为内部成员建立起一种“话语社团”（the societies of discourse），同时排斥未能掌控这套话语的外部人群，并在社会上建构起一套话语的等级。^[7]而在民改过程中，在新的国家政权逐步向藏区扩展时，学会和掌握一套适用于新政权的革命话语无疑表明了对话语的制造者——共产党所建立的新中国政权的认同态度，它表明了使用者鲜明的政治立场，是一种积极的政治身份的象征。这些革命话语抬升了其使用者的社会政治身份，并将封建领主、贵族、僧侣等剥削阶级排斥在外，建立起一个遍及民族地区普通百姓的“革命话语社团”。甚而在民改取得胜利之际，由于这一套话语的某种制约性力量，以前的封建领主阶级也不得不使用一套话语进行自我申辩以求自保。我们可以想象，当“剥削”、“压迫”、“人民当家作主”这些政治术语从无到有，到最后成为当地人人都讲、人人争着讲的日常用语时，制造这一套术语的政权的合法性也相应地生成了。语言的转换带来了政治体制与思想观念的转换。这些符号与表述决定着民族文化的意义……这些象征与表述……它们通过在想像的领域里使地方性的忠诚（local loyalties）同语言的变体（linguistic variations）融为一体，从而成为新国家的合法化的源泉。^[4]

在培训期间，格旺先生还两次随少数民族代表团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参观访问，一次是州团委组织的，一次是中央民族学院的“五期研究班”组织的集体访问团。在这两次参观访问中，代表团的成员们看到了火车、楼房、商场、工厂等以前从未见过的景象，住进了宾馆，尝到了以前从没吃过的东西。正是通过这些强烈的感官刺激，理念上的东西被转化成为了一种身体政治。当这些参观者回到当地时，这些新鲜事物又通过语言交谈传递给了民族地区的普通百姓，我们不难想象其中也许还会夹杂着夸张的描述和自己的深刻感受，以及所引起的当地少数民族的羡慕、想像和向往。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绝对不单单是语言机制的转换，在语言转换发生的同时，政治意识也随着语言的变体而被植入。当概念从一种与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其意义以及表述发生了“转型”，不如说在后者的地域性环境中得到了（再）创造。在这个意义上，翻译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4]恰恰相反，翻译本身就来自于政治，是一种带着强烈的中心主义色彩的表述。

除此之外，语言的翻译还与民族情感、身份认同、交谈动机等因素交织在一起。汉语和藏语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族群认同，当语言在二者之间转换时，作为第三方的翻译者的身份也在不断地转换，以适应交谈双方不同的身份认同。在这种特定情形下，语言成为了族群认同的最典型符号。在五六十年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大量的少数民族双语知识分子充当了翻译的角色，格旺先生也是其中之一。在语言与语言的交锋中，相同的语言（藏语）所产生的族群认同暂时淡化或隐去了这些本地少数民族的另一种身份——国家派来的对当地进行社会历史调查的工作人员；而当回到城市，回到汉语的语境中，这些翻译又和大学的老师、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成为了另一个群体中的“同志”，具有了另一种身份认同。因而，语言在某种情况下成为了翻译者可供利用的工具，以显示或掩饰特定的身份认同。另外，双重的身份认同还使翻译成为当地少数民族与外界联系的一个象征。如格旺先生所具有的“少数民族社会与历史调查”小组成员这一身份，使当地藏民很容易将他与更广阔的外界联系起来。“少数民族社会与历史调查”是由国家所认定和实施的，它代表着国家的权力话语。调查期间，调查组成员要定期到省里集中讨论、写材料，住在省民委的招待所里，下去搞调查，也有各级政府的宣传部负责接待。因而，这一身份将格旺先生与遥远的北京、中央、国家等名词联系起来，而在当地藏民心中，这些概念是相当模糊抽象的，能与他们直接交流的本地翻译就成为了这些抽象概念在

当地的具体符号。通过不断地在边地与省城之间的穿梭，将信息由此及彼，再由彼及此地传达，翻译实现的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一种话语权力由中心向边缘的扩散。它分别实现着国家话语的地方化和地方话语的国家化两个方面的意义。

四、结语

通过以上对格旺先生在五十年代的翻译经历的论述，笔者想要探讨的是三个方面的命题：一是边缘性对翻译的影响。笔者认为，正是因为康区这一区域的边缘性——它既是族群的边缘、多种语言的交汇点，同时上个世纪中期该地区也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新型国家过渡的历史的边缘。正是这样的多重边缘（muliti-boundaries）的性质，催生出了格旺这样跨语际实践者。二是翻译行为在构造历史真实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制造合法化术语的力量。当“剥削”、“压迫”、“阶级”这些词汇被翻译者带到康区，到最后成为当地老百姓人人都能说的常用语时，这一套术语的认知权威性也相应生成，并成为新国家合法化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家通过对语言的操纵，通过新的词语和新的意义，建构出了一套历史的真实，使其统治地位更加合法化。三是翻译与民族情感、身份认同、文化流动等的关系。在将此语言翻译为彼语言的过程中，翻译者的身份也在不停地发生转换，以适应不同的群体认同。身份的多重性，使翻译者成为我族与他族、边缘与中心、内部与外部的一个连接点，并由此带来了文化的流动、意识形态的流动和权力的扩散。

注 释

2007年6月，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与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的研究生联合组成了甘孜州民主改革口述历史调查小组，对甘孜州的康定、理塘和巴塘三个县城进行了为期两个星期的田野调查。本文的材料主要来自于本次口述史课题在巴塘对格旺先生的访谈。

刘禾先生提出的“跨语际实践”的概念：对于跨语际实践的强调，绝不是要把历史实践化约为语言实践；恰恰相反，我的目的是要扩展历史的观念，也就是说把语言、话语、文本（包括历史写作本身）视为真正的历史事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话语行为在构造历史真实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制造合法化术语的力量。

参考文献

- [1] 王明珂. 瓦寺土司的族源——一个对历史、神话与乡野传说的边缘研究 [J]: 历史人类学学刊, 2004年, 第1期
- [2] 成都军区西南戍边概览编写组. 西南戍边概览 [M].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P5
- [3] 任乃强. 西康图经 [M]. 拉萨: 西藏古籍出版社, P413
- [4] 刘禾. 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译介的现代性 [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P4
- [5]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吴叡人译)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 P120、130
- [6] 贝尔·胡克斯. 话语的秩序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 (许宝强、袁伟译)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年, P108、109
- [7] 米歇尔·福柯著. 话语的秩序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 (许宝强、袁伟译)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年, P17

[责任编辑: 林俊华]